

·学会之声·

编者按

2008年3月6日,北京传来噩耗:刘东生院士永远离开了我们。

没有人相信这是真的:先生身体不是好好的吗?虽然耄耋之年也听说稍有微恙,但经过治疗和调养很快出了院。不是吗?先生73岁那年去南极,79岁赴北极,86岁下南海,88岁走罗布泊,今年该91岁高寿了,还准备再给研究生上课,春节前出院,准备节后就上班呢!

但是,走了还是走了;先生近七十年的学术生涯画上了句号,但和蔼可亲的音容笑貌、平易近人的态度、孜孜不倦的精神和永不停歇的脚步永远留在人们的脑海中。

为悼念先生,回忆先生的为人,他的学生韩家懋研究员写下一篇短文,聊表怀念之情。

恩师,您怎么走得那么急?

——诀别之际的点滴回忆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韩家懋

2008年3月17日,刘东生先生静静地安睡在八宝山东大厅的鲜花丛中,还是那么平和,还是那么安详,像平时熟睡时一样,唯一缺少的只是听惯了的雷鸣般的呼噜声。

告别仪式结束,先生的遗体被缓缓抬出,随着人们散去,告别室渐渐平静下来。想到与先生从此阴阳两隔,再也看不到先生慈祥的面容,听不到谆谆教诲,眼泪情不自禁地汨汨而出,与先生交往40多年的往事一件件浮现在眼前。

那是1964年,全国地貌大会在南京召开。会间,来自各地的专家给南京大学地理系的学生做了很多场学术报告,虽然所有的报告都十分精彩,但留下记忆最深的就是刘先生就黄土研究介绍的我国第四纪研究的发展和现状。听完报告,心里默默念叨着,毕业后能在刘先生的指导下工作该有多好!但是说实在的,当时自己都为自己的“痴心妄想”感到好笑,专家们与我们的距离何只十万八千里?

也许是天意,也许是奇缘。一年后(1965年),我竟然真的成为刘先生的研究生。得到消息的时候,那种兴奋的心情真是难以言表。但是高兴归高兴,心理的压力还是很大的,自己的学识与先生的要求究竟差多远,实在感到忐忑不安。第一次与先生单独见面的印象十分深刻:记得当时先生正忙于准备珠峰的科学考察,办公桌上摆满了各种地图和资料。先生在简单问明了大学期间学习的课程、毕

业论文情况后,介绍了研究生专业课程的安排,告诉我第四纪科学实际上是介于地质(研究历史过程)与地理(研究现代过程)之间,或者说是介于地球科学与生命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研究第四纪时期地球历史和人类发展的科学。作为第四纪专业的研究生需要广泛的知识基础,告诫我要重视和加强地质与生物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积累。先生平易近人的风度和言简意赅、深入浅出的讲解,指明了第四纪研究的精髓,使我终身受益匪浅。刘先生的点拨,我的科学梦就这样开始了。

可是,好景不长,先是参加“四清”中断了研究生学业,“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更是无情地粉碎了我的科学梦,一切又复归平庸。

命运之神最次降临到我的头上,是先生调回北京的1979年,我再次成为先生的研究生回到北京。完成硕士研究生的论文答辩后,便立即与安芷生一起,分别作为地球化学所和地质所编写组的负责人,协助刘先生完成了《黄土与环境》的书稿撰写,并负责组织英文版《黄土与环境》的编译。在先生亲自指导下完成两本书编写工作,深深感到业务上有了很大的长进。

鉴于当时地质所的某领导声称在地质所“不发展第四纪研究”,先生领导研究组就那么几个人,更谈不上各方面条件的支持,日子过得十分艰难。但有刘先生的组织与领导,大家信心十足,都鼓足了劲,决心打出一片天地来。当时,出国学习的风气

正盛,而我,则只是想着一心一意在先生的指导下将黄土的研究深入下去。但先生高瞻远瞩,没有因为人手少而把学生留在身边,也没有因为自己是世界一流的黄土研究专家,而认为跟外国人学黄土研究是“浪费时间”。他希望研究组的成员都能出国深造,了解国外新的研究思路,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为此,他作了精心的安排:让年长一点的成员通过短期国际合作研究,出国工作;让年轻一点的去国外攻读学位。在他争取到国外的资助,有去比利时学习的机会时,便首先让我出国深造。在我为年纪偏大,对出国还犹犹豫豫的时候,刘先生还批评了我,就这样,被刘先生“赶”上了留洋之路。

俗话说“欲速则不达”,也许是当时国内的政策不完善,也许是我回国心切,对国外的管理体制了解不够,虽没有遇到语言、专业上的困难,却遇到了“程序性”的麻烦,我的留学之路走的并不顺畅。先生并没有“一送了之”,而是在时刻关心着我,他奔走于国内的各有关部门,顺访或专程到比利时,协调各种关系,为我顺利完成学业付出了很多很多。他作为答辩委员会的特邀成员,专程赴比利时参加我的博士论文答辩,在看到了我学业的进步,听到其他答辩委员会成员对论文研究工作的称赞时,先生的脸上露出了会心的微笑,并与其他答辩委员会的成员一起,庄重地在我的博士学位证书上签上了他的名字。

我是非常荣幸的,回国以后的十多年间,能作为他的主要助手之一,一直在先生的身边工作。陪伴先生参加了北京、柏林和德班的历次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INQUA)大会;伴随先生或者受先生的指派去世界各地参加一次又一次重要的国际学术活动;在先生担任国际第四纪研究联合会主席期

间,与先生一起接待并结识了国际第四纪科学界的一流科学家;协助先生申请、组织并实施完成了几项重大的科学项目;按照先生之嘱,编译了两本研究生的教材;与先生一道,带着他的几批研究生去黄土高原考察;受先生之托,与卢演倩一起,完成了先生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八五”重大项目成果整理和编写专著工作;承先生之信任,担负了中国第四纪研究委员会和《第四纪研究》期刊的部分工作;还在洛杉矶和北京的人民大会堂亲眼目睹先生荣获泰勒环境成就奖和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颁奖仪式。在先生的指导下,得到各方面的锻炼,工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在研究工作中,开拓了黄土中黏土矿物的研究,在环境磁学和环境同位素研究方面做了一点工作,成长为一名第四纪研究工作者。一生能遇到这样的一位恩师,真不知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没有先生的栽培,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尽管能力所限,离先生的要求还很远),只有尽心帮助先生做点什么,在科研中尽力而为,才能报答先生的培育之恩。

在得知刘先生患病并开始接受超强度的治疗之后,心一直总是揪着的,看着先生在与疾病的顽强抗争中一天天消瘦,但病中还时常惦记着未了的心愿,在病床上拿铅笔在小本子上记着点点滴滴的想法和要干的工作,总希望自己能多做点什么,借以帮助和安慰先生。

但是老天又是那样不公。3月5日晚间,得知先生已经进入抢救状态,匆匆赶到医院去看望,默默祝愿先生能挺过这一关。谁能料到,这竟是见先生的最后一面。

恩师,您怎么走得那么急!